

“液态联结”: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与逻辑机理

李 博,任雨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凭借漂泊-扎根的流动性实践,数字游民通过重塑城乡要素配置格局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藩篱,逐渐成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从“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出发,以“液态联结”概括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的结果表征,意指其在城乡之间构建起一种具备去中心化、双向性与适应性等特质的新型社会纽带,助推城乡迈向共生融合,由此揭示数字游民破除城乡边界和重塑城乡社会关系的逻辑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游民主要以身份、角色、发展的三重实践样态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并催生出共享办公、乡村文创、数字乡民等新业态,进而推动要素优化配置、身份平等认同、关系协同共生与价值共创共享。在逻辑机理层面,数字游民呈现出要素层面的脱域-再嵌入、身份层面的消解-再建构、关系层面的轻灵-再编织、价值层面的递转-再沉淀等,从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弥合城乡发展鸿沟。然而,数字游民同样面临职业化困境与身份焦虑、孤独感与社交障碍、稳定性不足与社会保障缺失等现实挑战。为此,仍要继续完善乡村数字宜养配套、满足数字游民生活需求;丰富乡村数字宜居内涵、再造数字游民社群关系;聚焦乡村数字宜业项目、拓宽数字游民生计来源,共同保障数字游民得以健康发展,创新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游民;城乡融合发展;“液态联结”;流动性;乡村全面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为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2],这从实现路径层面为地方政

府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城乡融合发展从“蓝图”迈向“实景”的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依然面临着空间资源配置失衡、地域功能定位冲突和居民生计保障不足等挑战^[3],极易激化城乡矛盾,影响城乡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在数字技术迅猛迭代与互联网全域渗透的双重驱动下,人才市场正迎来深层次变革,人才职业诉求发生根本性转变。数字游民是不受传统工作地点限制,通常从事有创造性和趣味性

引用本文:李博,任雨乐.“液态联结”: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与逻辑机理[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4):44-5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SH080);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ZHGG202404)

作者简介:李博(1987—),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研究。E-mail:lb8707@126.com

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同时致力于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新型就业形态^[4],且其职业形态多集中于知识密集型领域,主要包括内容创作、专业咨询、视觉传达及新媒体运营等。截至2025年底,全球数字游民超过4000万人^[5],标志着数字游民生活方式从“异类”到“主流”的发展趋势。《2026中国数字游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数字游民规模已达到800万人,90后、00后占数字游民群体比重超70%^[6]。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数字游民实践已经超越因职业形态而选择生活方式的单纯出发点,具有既可游离又可进入的“中间人”角色^[7],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实验形态,如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光山数字游民基地、西安秦托邦数字游民社区等。

因此,笔者将中国式数字游民概念界定为: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通过流动方式栖居于乡村或小城镇,既延续全球数字游民对工作自主与地理自由的追求,又主动或被动地嵌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过程,参与乡村产业、文化、社区再造的新型知识技能群体。依据职业方向、资源禀赋与在地融入的差异,数字游民大致可分为自由职业者、远程雇员、游民社区主理人、青创客、短期旅居者等类型。在社会学语境中,“液态”用以描述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而本研究所提出的“液态联结”,正是将这一社会学隐喻引入城乡关系分析,指数字游民在城乡之间构建起一种具备去中心化、双向性、适应性等特征的新型社会纽带,是其流动性实践的结果表征。这不仅体现为个体空间移动,更表现为一种在流动中重建联结、在嵌入中激发融合的社会过程,为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那么,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的实践样态表现为什么?该流动性实践又蕴含着怎样的逻辑机理?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以“液态联结”概括数字游民的实践表征,并建构“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从身份、角色、发展三重实践样态切入,探讨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障数字游民健康成长的优化策略。

二、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解构

1. 数字游民驱动下城乡融合发展的解读

围绕数字游民与城乡关系议题,既有研究由分析数字游民具身特质,逐渐转向考察其与特定地域的互动赋能。国外研究多聚焦数字游民现象的概念化与特征描绘,将其定义为依托便携式计算技术和广泛互联网接入,能够在任何地点远程工作,并利用这种自由探索世界的个人,本质上是应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不平等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机会主义适应^[8]。与传统移民群体相比,数字游民在工作社交中展现出更强的线上和分享行为^[9]。从流动性理论出发,数字游民生存状态存在着现实张力,全球性事件对其生活的冲击效应日益凸显^[10],对该群体的迁移逻辑与空间发展模式构成较大挑战^[1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内研究焦点则更为注重数字游民与乡村场域之间的具体互动,如在福建省龙潭村,大量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携手,尝试在乡村构建一种打破单一现代性叙事的“叠加式”生活,寻求另一种想象城市、重造社会的现代化方案^[12]。这种数字游民回流现象,被诠释为国家战略引领、乡村基础设施改善、乡村产业振兴机遇与乡村治理水平提升等多重动力下的理性选择^[13]。从互动视角来看,乡村通过内化外来资源,吸引并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创业;而数字游民则凭借其技能、资本与流量反哺乡村,创造新的经济社会价值,体现出彼此赋能的密切联系^[14]。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城市多元资本与乡村在地资源的协同创新,能够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挥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15]。

现有研究已清晰勾勒出数字游民从“进入乡村”到“融入乡村”再到“激活乡村”的成效经验,并开始关注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意义,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现象描述与个案分析,缺乏整合性理论框架,难以阐明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另一方面,对于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仍缺乏深入研究,未能清

晰揭示数字游民通过其日常实践“液化”城乡之间的壁垒,进而动态“联结”城乡社会的内在过程。为此,本研究将从“流动的双重性”视角,剖析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与逻辑机理,并进一步探讨数字游民健康发展的优化策略。

2. 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构建“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图1),以“液态联结”概括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的结果表征,并在“流动的现代性”宏观进程与“新流动性范式”微观工具的交叉视野中,系统阐释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与逻辑机理。

(1)“流动的现代性”:数字游民缘何驱动城乡融合发展

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成为解读数字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范式。鲍曼认为,现代性社会正经历着由“稳固”到“流动”的发展迭代,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不再奏效,但新的行动参照模式、规范和准则又尚未确定,整个社会既存在着认知混乱与不安全感,也充满了许多发展的可能性^[16]。数字游民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具身载体,受物理流动、社会流动、数字流动性共同催化形成,主动利用流动性“液化”那些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通过“有选择的联结”将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锚定于乡村场域,从而助推城乡全面融合。具体而言,一是物理流动,数字游民摆脱了传统工作

对固定场所的依赖,能够在乡村、小城镇或县城之间自由选择,带动了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二是社会流动,数字游民往往具备较高的学历、技能和工作经验,其职业身份多元且极具弹性,打破了传统城乡社会结构中的固有阶层;三是数字流动,数字游民依托互联网数字平台开展工作、社交与生活,实现了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云端化,一方面将城市的市场需求、创新理念和协作网络带入乡村,另一方面也将乡村的文化资源、生态价值和生活美学推广至更广阔的市场。

从这一视角审视,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桎梏始终源于以制度约束、地域边界、结构惯性为特征的“稳固的现代性社会”产物。一是制度约束,目前城乡要素流动仍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17],具体表现为户籍、住房、就业、教育等制度方面的不完善,难以消除城乡之间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限制;二是地域边界,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与福利鸿沟;三是结构惯性,城市始终是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由此导致乡村发展长期处于被动依附地位。因此,数字游民不是简单地进入乡村,而是通过认同转向、行为互动、价值共创的三重实践样态,着重强调在流动中保持连接、在嵌入中激发融合、在互动中重塑秩序,由此成为一种具象化表征,这也为实现城乡要素流动、身份平等、关系协同与价值共创提供了实践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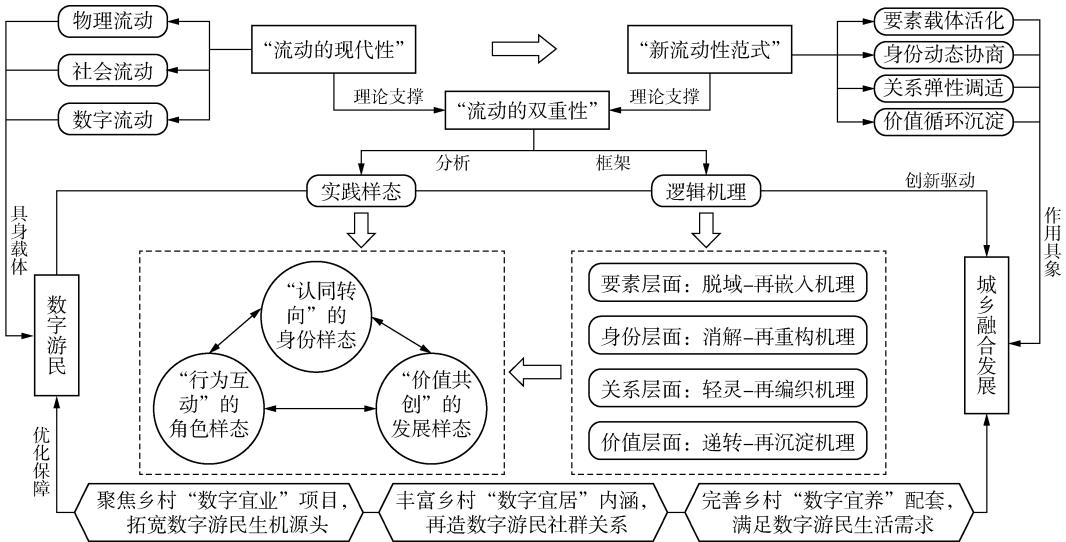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2)“新流动性范式”:数字游民以何驱动城乡融合发展

“流动的現代性”从结构层面揭示了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向,为理解数字游民现象提供了依据。然而,要具体分析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还需引入“新流动性范式”作为工具。由 Sheller 等提出的“新流动性范式”^[18]不仅关注实体空间中人与物的流动、虚拟空间中的信息流动,也重视想象、意象与情感的流动^[19],同时提倡要关注停顿、等待、滞留、放慢等各种非流动和减速现象,以及重视流动性的具身实践,描述流动主体与空间、地方、景观或环境之间的互动^[20],深入揭示流动如何被组织、感知并产生真实的社会效应。

基于此范式,数字游民对城乡融合的驱动作用可具象化为在要素、身份、关系与价值4个层面上开展的一系列流动性实践,提炼为以下机理:其一,以要素的载体活化,实现脱域-再嵌入。数字游民本身即知识、技能、信息与社会资本等要素的活化载体,从城市原有场景的脱域,并与乡村生态、文化、空间等在地资源进行再嵌入。其二,以身份的动态协商,促进消解-再建构。数字游民的身份属性是在流动中动态协商的产物,即在消解了与固定地域、稳定职业绑定的传统身份标签后,通过与本地社区持续互动,建构出数字乡民、乡村创客等新身份。其三,以关系的弹性调适,重造轻灵-再编织。轻灵指数字游民维持原有城市社会关系的低负担联结状态,并在线下社群共建、线上协作及与本地居民、机构的多维互动中,再编织出一种新型城乡合作的关系网络。其四,以价值的循环流动,激活递转-再沉淀。数字游民作为一种价值流动的媒介,推动城乡之间资源、能力与理念双向自由传递,城市生产要素注入乡村以驱动产业升级,乡村文化生态优势反向赋能城市发展,在这种循环流动中多元要素价值沉淀到乡村,并转化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3)“流动的双重性”:数字游民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耦合

“流动的現代性”与“新流动性范式”共同构成了“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的理论支撑:前者提供理解数字游民实践样态的结构视野,

后者则是剖析其逻辑机理的过程工具。“流动的双重性”作为分析框架,指向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而“液态联结”则是这一框架所解释的结果表征,二者形成解释与被解释的统摄关系。

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实践是结构趋势与行动过程的统一体,与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内在耦合,这就构成了“液态联结”得以生成并持续运作的现实基础。第一,实践样态耦合。从“地理套利”到“在地归属”的身份样态、从“旁观接受”到“协作共谋”的角色样态、从“空间栖居”到“深度参与”的发展样态,数字游民所呈现的三重转变正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回应与具体实践,这是在破界中立新、在流动中联结的辩证过程。第二,逻辑机理耦合。城乡融合的壁垒可操作化为与流动性实践互动的停泊点,而数字游民在要素、身份、关系与价值4个层面所展现出的脱域-再嵌入、消解-再建构、轻灵-再编织、递转-再沉淀等逻辑机理,恰好对应并作用于这些停泊点。在此基础上,数字游民成为“液化”城乡固有边界和重塑城乡社会“联结”的创新动力源泉。

三、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样态

基于对标准化都市景观和同质性消费体验的反思与拒绝,数字游民是具有求新、创造及追求自由与梦想的群体。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凝聚起数字游民的力量,赋予其新身份、新角色、新发展,引导其实现“游有所向、游有所归、游有所成”^[21]。笔者团队在2024年7月—2025年10月,先后多次前往浙江安吉、河南光山、陕西西安等数字游民集聚村开展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多种形式对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基层干部、本地村民等获取一手资料,并辅之以网络资料、出版物及当地提供的二手信息进行补充与验证,力求使研究真实、可靠。实践中,数字游民主要通过身份、角色、发展的三重实践样态驱动城乡融合发展。为直观呈现该驱动作用,从人口流向、资金注入、社会资本、产业形态及价值分配等维度,梳理形成数字游民介入前后城乡要素流动变化的对比情况(表1)。

表 1 数字游民驱动下城乡要素流动的前后对比

对比维度	传统的城乡要素流动	数字游民驱动的城乡要素流动
人口流动方向	农村青壮年向城市集聚	城市人才逆向流入乡村
资金注入方式	财政政策输血,依赖外部投入	外部市场造血,借助消费、创业、投资等渠道
社会资本结构	血缘地缘为主,外部进入困难	业缘趣缘关系增强,具备开放性与韧性
产业形态变化	乡村以原料输出、初级加工为主,附加值低	农文旅融合、内容电商、创意设计等高附加值业态涌现
价值分配格局	乡村价值被城市吸纳,本地留存有限	价值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部分沉淀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1. 认同转向:从“地理套利”到“在地归属”的身份样态

数字游民以数字化远程工作为经济来源,兼顾旅行兴趣,自主选择离开城市到生活成本较低、网络较好、风景优美的乡村,融合工作休闲体验“诗意栖居”的群体^[22]。这种游牧本质上源于地理套利逻辑,即利用城乡之间的生活成本落差,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再平衡。但也常因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中公共服务鸿沟、户籍制度壁垒等,陷入漂泊悬浮的状态,形成物理在场与身份游离的困境。据一位数字游民所说,“这种看似自由但漂泊无依的日子其实需要付出的代价很高。”(Web3 远程工作者 QQ, 20250904)^①当前,在城乡融合政策的推动作用下,数字游民正经历从地理套利者向在地归属者的认同转向,成了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载体。为加大对数字游民的支持力度,各地也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 2024 年《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举措》提出要给予激励、鼓励入乡发展、强化创业支持、优化就业服务等八方面^[23],意在围绕引、育、管、用层面招揽数字游民旅居共创,这也是全国首个设区市的数字游民专项政策。

然而,实现数字游民身份的转型不能仅依赖于政策制度的创新供给,更取决于乡村社会的情感归属建构。数字游民在借助技术手段,将乡村场景、本土文化转化为可传播、可生产、可销售的内容与产品,在城市消费市场中实现价值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乡土文化的现代转译者。同时,当以新乡民身份参与乡村红白喜事、节庆集会及治理事务时,其认知也自觉地从“他者”转向“共同体成员”,打破了与本地村民间的身份隔阂,逐步建立起数字游民的在地归属感。如浙江省湖州市依托建言献策主平台搭建游民会客厅,年轻的外来者们为辖区乡镇直

接引进了 50 余个新业态项目,在帮助村集体增收与农民致富中重塑身份认同、实现情感扎根。在此过程中,村社组织也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仪式性接纳、空间性赋权、制度性链接等手段积极介入并催化,有效降低了数字游民身份样态转换的摩擦成本。概言之,数字游民的身份转型绝非简单的制度层面差异,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打破资源分配和文化壁垒,建构起“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情感认同,并充分赋予其同等权利。只有当数字游民在乡村旅居生活中找寻到归属感和平等参与乡村发展,才能真正将漂泊转化为扎根、套利者升华为新乡民,并在此基础上助推城乡关系从“二元竞争对立”走向“一体融合协同”。

2. 行为互动:从“旁观接受”到“协作共谋”的角色样态

流动性是数字游民最为鲜明的特征。据 NCC 共居共创社区发布的《2024 年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指出,数字游民较多以 6 个月为周期更换目的地^[24]。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迭代,颠覆了传统工作的空间形态,瓦解了地理环境的职业束缚,促使人们得以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广袤田野进行就业,即在不断探索新地方的旅行过程中实现灵活工作^[25]。从学理层面考量,数字游民群体在进入乡土社会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基于地理套利逻辑以城市消费主体身份介入乡村空间的流动选择行为,本质上通过城乡生活成本剪刀差来实现经济效益优化的理性决策。由此,该角色实践必然呈现为旁观接受的现实特征,并体现着

① 为避免学术敏感性,对收集的数字游民信息进行匿名处理,具体命名规则如下:保留受访者职业信息,用以核验样本是否符合数字游民界定标准;对受访者姓名做模糊化处理,采用姓名拼音的首字母大写形式予以指代;结合访谈日期(年月日)构成统一编码。

延续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乡村作为客体的认知思维与行为逻辑。然而,随着驻留时间的延长,游民公社内部成员间的关系网络日趋紧密,对于乡村社会的情感认同逐日增强,角色样态开始发生由表及里的行为互动,即不再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依托自身专业技能,转化为主动协作者,融入乡村发展场域。

久而久之,凭借着迥异的专业思维习惯,一批从事创意设计、社区营造和新闻行业的游民先后与多个行政村展开合作,积极参与文创景观设施设计、各类公共活动指导、农旅产业更新方案等具体工作。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中,远程雇员更多是以个体技能直接助力当地白茶品牌升级;而游民社区主理人则侧重平台搭建、资源整合与社群运营,带动周边民宿、餐饮、文创等配套投资约2 000万元,年均吸引游民及相关访客超1.2万人次。此外,像光山数字游民基地,在补齐物理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打造社群空间与地方场景,并将工作导向从完成政府规定的任务指标转换为主动紧跟县域的发展方向,自我定位也从“后花园”调整为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流动的“桥头堡”^[26],一定程度上也在引导游民们深度嵌入地域社会。这种从旁观者到协作者的变化,标志着数字游民不再是乡村发展的局外人,而是成了荣辱与共、风险同担的利益共同体,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城乡融合式的生产生活,渐渐衍生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价值共创:从“空间栖居”到“深度参与”的发展样态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为摆脱科层制组织模式对自身生活时间的侵占,他们选择了远离惯常生活空间,追求自由游牧的生活方式^[27]。这种行为无疑是选择追求个体最大限度的自由,但也使他们从以往人际关系中被抽离,考验着个体在乡村环境下建立起人情往来的社交能力。同时,现实中数字游民收入的不稳定,使得他们的情感需求被放大,而其群体不稳定的情感联结则进一步加剧了心理上的孤独与焦虑感,陷入双重不稳定的困境。作为高素质人才群体,相当一部分数字游民通过自身本能链接了城市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市场等资

源,并试图让诸多外部要素进入乡村。据原乡映客数字游民绿洲计划发起人讲到,“引入数字游民来到乡村能够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推动人才和资源的双向流动。”(导演LYN, 20250908)这既为破解个体工作和情感不稳定困境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乡村现有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文旅产业、特色产业等新业态发展壮大。

以西安秦托邦数字游民社区为例,该社区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共享办公、会议健身等设施环境,还通过整合整村资源,将数字游民的生活、工作与乡村发展紧密衔接。正如游民社区成员所言,“秦托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与村庄的深度融合,我们不仅仅是这里的居住者,更是参与者。”(策划工作者BB, 20241210)在此模式下,数字游民不再局限于独立空间,而是漫步于乡村街道之中,接触本地各类业态,依托自身的专业能力参与,助力当地打造村咖+民宿+文创+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将创意与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实际收益,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28]。在数字游民的带动下,截至2025年12月,栗峪口村人均收入已增至近2.5万元,较5年前翻了两番,这种数实结合的创新模式,正重新定义乡村价值,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这种价值共创的发展样态,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收入可保障、社会有认同、情感能归属,也推动着乡村产业升级、社区活力焕发与治理效能提升。二者在共创中逐渐形成深度互嵌、共生共荣的发展共同体,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了兼具创新性、嵌入性与可持续性的新质动能。

四、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

人的能动性不仅体现为劳动力、技术与资本等生产要素载体,更构成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推动力。从“流动的双重性”视角审视,现阶段城乡融合进程受阻,根源在于“稳固的现代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约束、地域边界及结构惯性等刚性壁垒。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实践充分呈现出要素层面的脱域-再嵌入、身份层面的消解-再建构、关系层面的轻灵-再编织、价值层面的递转-再沉淀等逻辑机理,将

个体价值与乡土发展相耦合,成为推动乡村建设、发展与治理的在地化力量,并在微观层面逐渐浮现出促进城乡融合的可能^[29]。

1. 要素层面:数字游民的脱域-再嵌入机理

要素壁垒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梗阻,数字游民凭借可以不受时空约束的线上工作形式与城乡区域流动的地理套利偏好,天然具备特定的灵活性与自由度,能够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地域以及从事的行业与职业。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要素固着状态,并通过再嵌入以实现要素的优化重组,从而重构城乡要素配置格局。脱域体现为数字游民摆脱办公场所、时间等物理时空束缚,破除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与就业等地域限制,带动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从城市向乡村逆向流动,继而改善了乡村长久以来作为资源流出地的现实状况。如光山数字游民基地通过改造老库粮仓和民居,运营后4个月内吸引接待数字游民400余人次,并先后策划举办奋斗青年说、亲子趣玩节、首届乡村儿童电影周、时装设计研学营等30余项活动,组织了42场乡村产业对接活动,实现了要素的跨域引入。

再嵌入方面,核心在于数字游民将城市资本、技术、经验与乡村农业、生态、文化资源进行跨空间组合匹配,体现出其精准激活乡村本土资源,从而实现要素价值的在地增值。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数字游民能够弥合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基础^[30],这就要求打破传统偏向城市发展观念、缩小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破除要素流动体制机制障碍。如索托邦数字游民社区通过整合整村资源,引导数字游民参与村咖+民宿+文创+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打造,将创意设计、运营思维等软要素嵌入乡村实体产业,使栗峪口村从缺人、缺钱到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仅2024年综合经济收入达到6000余万元。数字游民的实践恰好回应这一取向,即在流动过程中液化传统刚性壁垒的同时,培育出要素增值下城乡交流的内生动力,这本质上是数字时代人的发展与区域发展的深度嵌套。当个体能够自由选择与要素的结合方式,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边界便开始软化,进而形成了以人的自由流动带动资本、

技术、文化等要素精准配置的融合新范式,从而印证要素脱域-再嵌入是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的基础机理。

2. 身份层面:数字游民的消解-再建构机理

户籍、职业等身份认知的隔阂,加深了城市优于乡村的思想观念,成为城乡居民平等互动的深层梗阻。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载体,数字游民大多是高技能、高学历、高收入人群,具备应用互联网的专业技能。这意味着,数字游民具备相对较高的创新创业精神,能够保持对乡村新业态的敏锐嗅觉、抓住乡村产业发展的创新动向和适应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需求,进而打破传统身份标签、塑造兼具城乡特质的全新身份,成为其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机理。一方面,身份消解表现为数字游民脱离与传统地域、职业绑定的固化身份,进入一种流动、开放的中间状态,这是打破城乡壁垒的起点。无论身处城市抑或乡村,从事内容创作、运营咨询的数字游民只需在数字平台上即可实现劳动价值并获取报酬,从而极大弱化了身份角色的束缚,使每个人都具备无穷的发展潜能。如此一来,数字游民原有的职业身份、地域属性和社会角色就经历了一种消解。

另一方面,身份再建构则发生于数字游民与乡村社区的持续互动中,通过参与本地生产、生活与治理,共同塑造出全新身份,这也是实现城乡全面融合的关键。数字游民凭借自身的T型技能结构在地参与乡村发展行动,逐步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建构出诸如数字乡民、新农人等兼具城乡特质的新型身份角色。互动过程凸显集体意识而非个人意识,城市的法治观念与乡村的礼治秩序得到较好地融合。具体而言,数字游民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力、打破传统城乡产业边界,关键在于运用数字游民的创意技能,将乡村生态、文化资源与城市消费需求精准对接,发展出乡村产业新业态,以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新阶段,进而实现城乡间水乳交融的良性发展态势。如在安吉,数字游民深度参与民宿运营、文创开发过程,逐渐被本地社群接纳为新乡民。

然而,这一建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种种阻力:一是数字游民所秉持的价值伦

理与乡村社会中强调人情伦理、差序格局的传统交往规则存在摩擦;二是数字游民的涌入会推高房租、物价,挤占原本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给当地居民带来“相对剥夺感”,并可能转化为对外来者的隐性排斥。此外,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企帮村的产业深度融合,这不仅需要数字游民以自身能力摆脱乡村产业发展困境、激活乡村自身创造力,更需要村社组织发挥作用,在差异中寻找共识,在摩擦中塑造信任,共同推动城乡走向内生自发融合。

3. 关系层面:数字游民的轻灵-再编织机理

由于帮扶单向性、乡村社会相对封闭性等的影响,城乡关系往往显得沉重且低效。而数字游民通过轻灵-再编织的关系实践,以弹性化、高效率的方式重新勾连城乡联结,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成为驱动城乡融合的关键机理。

其一,关系的轻灵指借助数字工具,维持原有城市社会关系的低负担联结,同时以轻资产、项目制的方式介入乡村,避免传统帮扶带来的依赖感与沉重负担,便于助推形成灵活、高效、无负担的城乡互动。面对以“996”“007”等为代表的职场福报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数字游民从一开始便被赋予成为一条介于躺平与内卷之间、兼顾生存与理想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数字游民对美好乡村理想化追求的生活模式,实质上是获取乡村的生态溢价与生活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凭借互联网工具,跳过行政或商业中介,直接打通城乡供需链路,既减少了中间环节的利益损耗,也让城乡互动更贴近真实需求。

其二,再编织则体现为数字游民在乡村场域中主动构建新的关系网络,得以重塑城乡联结逻辑,形成城乡互通、内外开放的新型生态。一方面,数字游民的介入使乡村从地缘社会向业缘社会延伸;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的跨空间流动使其成为城乡资源要素的载体,推动城乡从单向依附转向双向互动。如浙江湖州通过游民会客厅这一平台,引导数字游民为乡镇引进新业态项目,在协作中共谋发展,编织出新型城乡合作网络。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这一再编织

过程的实质,是数字游民所携带的“弱连接”对乡村既有“强连接”网络的激活与再造。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结构,数字游民将城市企业、行业社群、线上平台等异质性网络节点引入并盘活。

然而,当前乡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很难满足其群体的生活需求,暴露了城乡发展鸿沟的深层矛盾。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要积极回应进城农民和下乡市民需求,有效保障城乡居民财产权益和民主权利,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权益平等化^[31]。不难看出,数字游民的流动性实践揭示了关系轻灵-再编织既满足了自身对慢生活的追求,也让城乡居民在平等协作中逐步消除认知隔阂,实现流动中共享发展机会。

4. 价值层面:数字游民的递转-再沉淀机理

价值分配失衡造就了城乡融合发展始终停留在表层、难以纵深推进的现实格局,数字游民通过在地化社群,促使价值由单向流动向双向递转转向,并以价值再沉淀于乡土社会,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成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机理。尽管数字游民享受着地点独立带来的高度自由,但孤独和隔绝的代价仍然存在。于是,该群体会尝试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同类人组成社群关系,组建共同生活和工作空间;同时,在城乡之间搭建起双向、高效的价值递转通道,以寻求情感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助推城市价值向乡村递转,即数字游民以自身高人力资本为核心,将城市积累的资源转化为乡村可吸纳、可承接、可落实的能力,推动形成“授人以渔”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助力乡村价值向城市递转,即通过深度在地化实践,识别并活化乡村生态资产与文化资源,借助场景叙事、包装体验与数字传播路径,将其转化为可触达城市消费市场的有效供给。概言之,这一双向递转过程,实质上是在探索中持续追求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公约数,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进路。

然而,递转只是价值流动的过程,而再沉淀才是价值落地的关键:其一,产业红利价值的再沉淀。数字游民自身特有的资源和技能,以传帮带得以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能力,破解了传

统乡村产业经营的边际效益困境。其二,社会资本价值的再沉淀。在与村民各种生活或工作的交往中,数字游民构建的社群逐渐内化为乡村社会资本。其三,文化自信价值的再沉淀。数字游民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诸如拍摄乡村非遗纪录片、设计乡村文创产品等形式,更增添村民的文化自信感。如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举行“忙罢艺术节”,最初由入驻的数字游民、艺术家、村委干部等共同策划发起,通过组织本地村民参与创作、布展与运营,以当代艺术形式注入传统的农忙节庆,将麦田、农具、地方戏曲等元素转化为艺术表演内容,在共同劳作与庆典中凝结起信任情感,增强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与经营能力。在数字游民的价值递转—再沉淀驱动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日益清晰,并逐步深入践行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理念。

五、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优化策略

数字游民拥有弹性工作时间、不受地理限制、收入来源多样等职业特征,具备自由、灵活和多元的就业优势,成了破解城乡要素错配、激活乡村内源动力的关键力量。然而,数字游民也面临着职业化与身份焦虑、孤独感与社交障碍、稳定性与保障缺失等现实挑战:在制度层面,社会保障与治理体系尚不健全;在市场层面,就业生态与收入结构具有不确定性;在社会层面,文化差异与社群融入仍存在隐性隔阂。为促进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有待从数字游民生活需求的满足、数字游民社群关系的再造、数字游民生计源头的拓宽等方面发力,以更好地为城乡融合发展释放充足的新质动能。

1. 完善乡村数字宜养配套,满足数字游民生活需求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游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乡村网络信息服务体系与数字化生产模式日趋完善,为数字游民融入乡村的工作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相较于乡村原住民,旅居型数字游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因此,破除信息壁垒、弥合服

务差距,构成了乡村建设赋能数字游民的关键路径。在此基础上,生态环境亦是吸引数字游民集聚的重要禀赋。为满足其对自然化工作场景的空间诉求,就必须围绕乡村生态与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改善,进而增强对数字游民的黏合效应,以吸引数字游民的扎根和久居。

其一,要加快健全针对数字游民的保障服务体系。一方面,基层政府通过持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升网络带宽容量、运动休闲空间等承载能力,以夯实数字游民异地办公与生活的基础保障。另一方面,针对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现实难点、痛点和堵点,应从政策层面畅通城乡之间市场信息、养老医疗等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渠道,依托数字化手段逐步弥合城乡发展差距,并搭建面向数字游民的一站式服务入口,有效回应弹性就业情境下衍生的多元诉求。其二,要推进与数字游民需求相适应的乡村生态与人居环境优化。在乡村生态优化方面,村委会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准感知并回应乡村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通过美化景观环境、扩大植被覆盖,以增强自然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在人居环境优化方面,积极引入企业、社会组织对传统农房进行智能化改造,建设具备环境自适应调节功能的数字农舍;或可在稻田、竹林等自然场景中嵌入办公舱体,营造工作空间与自然生态有机交融的共生场景,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协调统一。

2. 丰富乡村数字宜居内涵,再造数字游民社群关系

面对流动生活所伴随的外部风险,数字游民只能依靠个人赋能来确保自身安全感,而当个人的心境或收入发生变化时,这种生活方式极易受到冲击。在数字乡村空间营造的基础上,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及游民社区等多方主体需要再造数字游民社群关系,着力建构起物质支撑与精神认同的联结纽带,进一步丰富乡村数字宜居内涵,形塑兼具自由、稳定的数字游民社群生态,有效化解游民因高度流动性所衍生的不稳定性与归属缺失。

其一,精准定位社群属性,构建差异化联结的情感关系网络。依据数字游民的兴趣专长、

职业领域与价值取向,游民社区应锚定数字游民社群的价值联结节点,分别以趣缘链接激发创意共鸣、业缘协同促进技能互补、地缘活化再造乡土认同,由此织密成员间多元且立体的情感关系网络。

其二,优化社群治理结构,创设开放性包容的共享空间范式。一方面,村社组织建立健全涵盖言行规范、信息发布的公约准则,维系数字游民社群运行秩序;另一方面,游民社区搭建多元观点对话平台,尊重成员异质性表达,形成兼具规矩约束与开放包容的生活场域。其中,游牧生活中的情感疏离得以消解,数字游民的归属感也更加稳固。

其三,强化社群互动机制,拓宽数字化驱动的互动沟通渠道。依托社交网络媒体与即时通信工具的多维互动,游民社区定期通过线上主题研讨、经验分享与线下辩论沙龙、运动展演等活动,促进成员间实现信息交换与情感共鸣,以社交实践强化社群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四,打造在地社群平台,构建高黏性吸引的地方支持体系。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人才库、驿站等形式,掌握数字游民人才的基础信息与专业技能,切实为其提供政策支持与人文关怀;另一方面,通过村社组织提供心理情感支持,巧妙借助搭子文化,营造兼具人文温度与情感韧性的治理生态,营造兼具人文温度与情感韧性的治理生态,营造共创共享、共生共赢的发展格局,从而使数字游民得以顺畅融入地方社会,积极参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程。

3. 聚焦乡村数字宜业项目,拓宽数字游民生计源头

当前,不稳定感与社会保障缺位是数字游民追求这种生活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应通过聚焦乡村数字宜业项目,并拓宽数字游民生计源头来实现双向赋能。要依托数字游民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基础,吸引创新项目落地并创造经济收益;推动数字游民共享乡村发展红利,有效消解其旅居就业的后顾之忧,实现乡村与数字游民的双向共赢。

其一,高效整合多渠道数字人才产业服务平台,打通城乡之间的人才双向服务通道。具

体而言,通过成立数字游民人才驿站,建立数字游民人才库,用于掌握数字游民人才的基础信息、专业技能和资源潜力;同时推出人才专员机制,开发小程序对接数字游民与政府需求,引导合适人才匹配适宜的在地项目,逐步形成以基地(社区)为综合平台、覆盖城乡的数字人才服务系统。此外,充分发挥数字游民的先进理念和开阔眼界带来的优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各展所长,促使数字游民由流动转变为沉淀,从而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其二,积极招引更多数字宜业融合项目落地,主动创造适宜数字游民的乡村新型就业。为此,可着力打造数字游民工作区、数字经济培训基地、数创综合服务中心和合伙人共创空间等多类型产业创业平台,在创业空间、餐饮住宿、项目运营、人才引育、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在此基础上,引导数字游民群体对乡村各类优质闲置的资金资产资源进行有效盘活,从而切实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使人才振兴真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其三,创新建立数字游民人才评价体系,并将其纳入乡村人才振兴的统计口径。一方面,鉴于数字游民流动性强、工作地点不固定、内部差异大等特点,可依托数字游民社区、人才驿站等载体,将该群体的实际贡献纳入评价依据,制定分层分类的认定标准,构建“弹性注册+动态考核”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乡村振兴统计监测中,应增设数字游民引进产业项目数、带动就业人数等指标,从而方便该群体获得更为充分的政策资源倾斜。

六、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城乡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当前数智时代,要推动技术从善智载体转化为善治要素离不开自由职业者、远程雇员、游民社区主理人、青创客、短期旅居者等各类数字游民群体的创新性实践,以此形成城乡互联互通、互补互融的发展共同体,让秀美乡村和现代城市交相辉映,实现城乡共生共荣。为进一步厘清数字游民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联,通过构建“流动的双重性”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

提炼出“液态联结”这一核心概念,分析数字游民如何以身份、角色、发展的三重实践样态驱动着城乡融合发展,深入阐释数字游民如何“液化”城乡固有边界,重塑城乡社会“联结”的逻辑机理,进而尝试提出保障数字游民健康成长的优化策略,培育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质动能。其中,“流动的双重性”作为分析框架,意在揭示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而“液态联结”则是该框架所解释的结果表征,即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所生成的城乡关系新形态,二者构成解释与被解释的统摄关系。

就研究解释力而言,“流动的双重性”更具学理深度,更能衔接起宏微观界面,其创新价值体现为:一是实践样态,数字游民通过认同转向、行为互动、价值共创等样态变化,促进城乡融合迈向新的台阶、达到新的高度、开创新的格局。具言之,从“地理套利”到“在地归属”的身份样态、从“旁观接受”到“协作共谋”的角色样态、从“空间栖居”到“深度参与”的发展样态,日益成为破解城乡发展鸿沟、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变量。二是逻辑机理,数字游民作为“流动的現代性”的具身载体,受物理、社会、数字流动性共同催化形成,具体以要素层面的脱域—再嵌入、身份层面的消解—再重构、关系层面的轻灵—再编织、价值层面的递转—再沉淀等内在机理,主动“液化”城乡刚性壁垒,“联结”城乡社会网络,为数字游民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数字时代城乡全面融合指明了发展进路。

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现象,其内在特征与城乡融合发展天然存在多重耦合,笔者提出的“流动的双重性”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所归纳出的“液态联结”概念,可能更多适用于数字设施建设较为完备、数字乡村发展更为成熟的较发达地区。未来研究有望在以下方面不断深化:一是关注数字游民与乡村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与协同逻辑,尤其注意可能存在的张力与调适;二是开展多区域、多类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不同制度环境、资源禀赋与社群生态下数字游民流动性实践的路径差异。其中,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区位禀赋各不相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及要求有所区别,探究数字游民驱

动城乡融合发展应进一步予以类型化分析。此外,也需警惕流动性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如游民群体的短暂性、本地社区认同稀释、公共服务压力隐性增加等潜在风险。如何在激发流动活力的同时增强乡村发展的主体性与可持续性,仍是未来研究始终要关切的重要议题。总之,数字游民作为流动时代的新型社会力量,其“液态联结”实践为推动城乡关系向更加平等开放、协同共享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4:2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77.
- [3] 钟苏娟,黄贤金,贾锴阳.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基于中国特色实践的一般性分析框架[J]. 中国农村经济,2026(5): 24-44.
- [4] 姚建华.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游民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2):126-129.
- [5] Naveen K. Digital nomads statistics 2026—salary data & facts [EB/OL]. (2025-12-30) [2026-07-30]. <https://www.demandsage.com/digital-nomads-statistics>.
- [6] 智联招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26 中国数字游民发展报告[R]. (2026-06-04) [2026-07-30]. https://www.sohu.com/a/1032212833_122759224.
- [7] 刘博.“液态”的“中间人”:中国数字游民的结构性质悬浮与过渡性实践[J]. 新闻大学,2025(6): 105-117.
- [8] Mancinelli F. Digital nomads: freedom, responsibility and the neoliberal order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0, 22(3): 417-437.
- [9] Yang C R, Shao J, Zhao Y M. Post-COVID-19 sojourn choices: explor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preferences of chinese digital nomads based on the lifestyle migration theory [J]. Sustainability, 2025, 17(1):130-130.
- [10] Xiao Y H, Lutz C. Wayfarers in cyberspace: a temporal investigation of digital nomads based on liquid modernity theory [J]. Journal of Travel

- Research,2025,64(4):966-984.
- [11] Koufodontis N I,Gaki E. Digital nomads or digital settlers? Rethink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Geoforum,2025,167,104466.
- [12] 孙歌. 四十七树:另一种现代化愿景[J]. 文化纵横,2025(5):96-102.
- [13] 王轶. 数字游民何以选择回流乡村[J]. 人民论坛,2025(20):86-89.
- [14] 赵永丽,左停. 双向赋能:数字游民与乡村互动的多案例扎根分析[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5(4):75-84.
- [15] 王忠,林珑. 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模型、图景及反思——兼论数字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J]. 江海学刊,2025(3):12-18.
- [16]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化性[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2.
- [17] 余敏江,方熠威.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以浙江省湖州市“共富班车”实践为例[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5(4):105-114.
- [18] Sheller M,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 (2): 207-226.
- [19] Urry J. Mobile sociology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0,51(1):185-203.
- [20] 刘英,朱新竹. 新流动性范式与新物质主义的对话与交融:流动性研究的新动向[J]. 世界社会科学,2025(1):226-241.
- [21] 李东航. 引导数字游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J]. 人民论坛,2025(5):87-89.
- [22] 周碧蕾. 本土数字游民:内涵特征与形成机理[J]. 求索,2024(6):62-71.
- [23] 丽水市委人才办,共青团丽水市委,丽水市科技局,等. 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措施[EB/OL]. (2024-12-18) (2026-03-05). https://www.lishui.gov.cn/art/2024/12/19/art_1229218389_57366957.html.
- [24] NCC 共居共创社区. 2024 年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 [R/OL]. (2024-12-01) [2026-08-01]. https://www.sohu.com/a/832144308_121124366.
- [25] 凯莉斯·纳什,穆罕默德·侯赛因·贾拉希,威尔·萨瑟兰,等.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J]. 青年探索,2023(6):102-110.
- [26] 沙垚. 流动作为方法:数字游民在中国乡村——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J]. 新闻界,2024(4):28-35.
- [27] 徐琳岚,文春英.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23(8):70-79.
- [28] 李卓,杨春兰. 城乡融合背景下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研究——以西安市鄠邑区蔡家坡村为例[J]. 文化产业导刊,2026(1):80-87.
- [29] 曾昕,沙垚. 虚拟与现实的居间地带:数字游牧青年的新型社会化实践[J]. 新闻与写作,2024(12):16-25.
- [30] 杨昕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2):147-160.
- [31] 曾恒源,高强. 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重点、挑战与建议[J]. 农村经济,2025(2):39-46.

“Liquid Connectivity”: The Practical Patterns and Logical Mechanisms of Digital Nomads Driv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Li Bo, Ren Yul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Digital nomads, through their mobile-rooted practices, gradually become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y reshaping the allocation 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nd dismantling the barriers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dual nature of mobility”, the concept of “liquid connections” encapsulates the outcomes of digital nomads’ mobility practices, signifying the creation of a new type of social bo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haracterized by decentralization, bidirectionality, and adaptability, thereby facilitating urban-rural symbiotic integration. This elucidates the 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nomads dissolve inherent urban-rural boundaries and reshape social relations across these spa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nomads primarily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ree practical dimensions: identity, role, and development, engendering new business forms such as co-working spaces,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and digital villagers. Consequently, they drive the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qual recognition of identities, collaborative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nd value co-creation and sharing. At the mechanism level, digital nomads exhibit factor-level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embedding, identity-level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level flexibility and rewearing, as well as value-level transfer and re-accumulation, thereby activating endogenous rural potential and bridging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gap. Nevertheless, digital nomads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nd identity anxiety, feeling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barriers, and lack of stability and security. Therefore, it remains essential to continue enhancing rural digital-friendly support systems to meet the living needs of digital nomads; enrich the concept of digitally livable rural areas and reconstruct digital nomad community networks; and focus on digitally suitable rural industry projects and expand sources of livelihood for digital nomads, collectively ensuring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on-driv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digital noma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liquid connection”; mobi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across the board